

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

[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董强 译

一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与中国热情的听众见面。三十五年前，也就是 1974 年五月，我与菲利普·索莱斯和其他被我们的邀请方称为“《求是》杂志的同志们”的几个朋友（罗兰·巴特、弗朗索瓦·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一道，首次访问了中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接待的第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

与当时人们所说的相反，我们的那次访问并非对当时占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完全支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我的那些朋友们来说也应当是只是各人情况有所不同而已。当时的我，对中国文明充满了好奇，同时对在那里发生的政治变革也抱有同样的好奇。而且，我当时在巴黎七大已经注册了四年中文。今天，这所大学依然是我任教的地方。我带着激情阅读了李约瑟的《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我非常好奇，希望找到答案，至少可以回答我下面要说的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

一、如果说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不同，那么，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如何帮助形成了这一谜一般的“中国式道路”？

二、中国传统关于因果、神圣、阴阳、语言与文字的一些观念，是否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主观性”，与在西方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所形成的不同。假如是的话，这些主观的经验又如何能够与我们普遍而又多元的人类其他文明相遇、相对立或共存。

你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些问题，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来说，既能掀起激情，又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然而，我当时所见到的中国现实，还是深深吸引了我，因为它强调妇女在过去和现代的解放问题。当时，作为“文革”